

# 应用型本科大学40年:历史、特征与变革

李 均 何伟光\*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应用型本科大学嬗变历程可大致划分为“雏形萌动”“模式探索”“规模扩张”和“转型变革”四个阶段,发展特征体现为:实践驱动的演进路径,自下而上的推进方式,灵活多样的创建模式。新时代要通过依法确立应用型本科大学的“社会威信”、探索应用型本科大学办学新模式、构建“四位一体”产教融合大格局,推动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大学;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增长到2017年的近45%，“整体上进入世界中上水平”，正在“从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迅速迈进”。<sup>①</sup>在此进程中,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崛起功不可没。系统梳理40年来中国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嬗变历程,分析其发展特征,探讨其变革方向,对于加快新时代中国应用型本科大学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 一、嬗变历程

应用型本科大学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型大学。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模式举办的工、农、医、师等行业类院校也具备应用型大学的属性,但应用型本科大学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即体现“四个为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以教学为主”“以面向地方为主”。<sup>②</sup>所以,应用型本科大学特指改革开放后新建的、体现上述“四个为主”的新型大学。

### (一) 雏形萌动(1978—1984)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由于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与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不适应,尤其是“四化”建设急需的各类应用型人才严重短缺。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专门为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大学应运而生。

---

\*李均,教育学博士,深圳大学高教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518067;何伟光,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518060。本文是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的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吴岩:《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新形势》,《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9日第13版。

②潘懋元:《什么是应用型本科?》,《高教探索》2010年第1期。

我国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源头,可追溯到改革开放初天津、北京等城市创建的大学分校。1977年高考恢复后,由于当时大学办学规模小,难以满足广大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于是,天津市率先在1978年向中央申请依托已有大学举办分校,招收本地生源。经中央批准后,天津先后创建了10所左右的大学分校。后来,北京借鉴天津经验,也创建了36所大学分校。尽管办学条件不足,但大学分校在学制与课程标准上与校本部基本一致。由于这些大学分校举办的是本科层次教育,而且主要以服务本地经济为主,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有学者将这些大学分校视为我国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开端。<sup>①</sup>

80年代初,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汕头大学、深圳大学等地方中心城市举办的新大学破土而出。这些新大学从诞生伊始就以服务地方、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为追求。如创建于1983年的深圳大学,尽管得到了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对口支援,但创校校长张维不以复制北大清华为目标,而是要办成一所以应用为特色的特区大学。因此,深圳大学早期创办的不少专业都冠以“应用”两字,如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等。<sup>②</sup>

这一时期,尚无“应用型本科”的概念,中央也没有相应政策推动这一工作。地方政府通过举办大学分校和新大学来培养服务于地方的应用型人才,更多受地方经济建设的驱动,是一种地方自发性行为。尽管如此,大学分校和中心城市新大学的创建意味着应用型本科大学雏形的萌动,特别是深圳大学等新大学针对应用型本科人才的探索,为后来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初样本。

## （二）模式探索（1985—1998）

1985年《中央关于改革教育体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决定》提出:“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实行多种形式办学,培养多种规格人才”;“高等教育要重点发展应用性学科和专业”;“要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上述重要文件的出台,直接促进了应用型本科大学模式的形成:中心城市办学体制及多样化办学方针的确立,使应用型本科大学有了立足地方的土壤和依据;应用型学科和应用型人才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重视,使应用型本科大学有了实质性的办学内涵与方向。

与此同时,国内高教研究界开始研讨应用型本科、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概念及相关理论问题。较早的论文出现在1998年,如肖国安的《准确定位,突出特色——应用型工科大学办学思考》、龚震伟的《应用型本科应重视创造性的培养》、程勉中的《谈应用型工程本科的改革思路》等。其中,肖国安的论文将其所在学校定位为“应用型”。<sup>③</sup>

在国家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共同推动下,具备前述“四个为主”特征的高校陆续创建,应用型本科大学模式初步形成。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决定》颁布后,宁波大学、五邑大学等20多所具有鲜明应用型本科特征的大学陆续在沿海地区及内陆中心城市创建。1993年《纲要》颁布后,更是掀起应用型本科大学创建高潮。除了新建高校外,一批80年代创建的短期职业大学陆续升格为本科层次的应用型大学。至1999年高校扩招前,符合或基本符合应用型本科大学特征的高校超过100所。

值得注意的,中外合作办学也成为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新模式。1992年,根据中德两国政府的合作办学需要,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正式诞生,这是借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模式进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

①张楠、孙晓鲲:《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形成逻辑与启示——以北京地区大学分校(1978—1985年)为例》,《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②杨移贻:《特区大学 窗口大学 实验大学:深圳大学办学实践探索》,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③肖国安:《准确定位 突出特色——应用型工科大学办学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8年第1期。

养的试点高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在校名中含有“应用”一词的本科高校。<sup>①</sup>

### （三）规模扩张（1999—2013）

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第一次明确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15%”的战略目标,正式吹响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斗号角。此后连续十几年的高等学校大扩招,为应用型本科大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为了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一批本科高校被创建,大批专科层次的地方高校升格为本科高校。由于这些高校多定位于“应用型”和“地方性”,被学界统称为“新建本科院校”。至2013年,新建本科院校达600多所。这一时期有两类特殊的应用型本科大学:一类是依托公办大学创建的独立学院,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等,数量最多时达到360多所(2003年);另一类是由民办专科高校升格而生的民办本科高校,如黄河科技学院、西安外事学院、白云学院等,截至2013年,民办本科高校达到95所。

这一时期,“应用型本科”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概念,而是教育决策层关注的重要改革。2001年,教育部在长春召开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2002年,在教育部支持下,“全国工程应用型本科教育协作组”正式成立。2008年,安徽省内十几所新建本科院校率先组成了国内第一个省级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部分)联盟”。后来,四川、浙江、湖北、山西、吉林、广西、云南等省份相继成立了省级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2013年,全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在天津正式成立。

### （四）转型变革（2014年至今）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向应用型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提及到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随后,多个重要国家政策文件提及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如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等。2015年10月,三部委正式颁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意见》。上述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应用型本科大学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近年来,以“转型”为重点的应用型本科大学改革蓬勃展开。从推进层次看,应用型本科大学建设已经从过去的地方探索和省级试点,发展到中央决策与统筹;从发展规模来看,从世纪之初的几十所试点高校发展到600多所试点高校;从院校类型看,应用型本科大学分化为应用技术大学和教学服务型大学两大阵营,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类型更加丰富;从改革重点看,“产教融合”受到高度重视,从单一的教育政策上升为综合性的国家战略。今天,应用型本科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发展特征

中国应用型本科大学从蹒跚起步到蓬勃发展走过了40年的不凡征程。与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演进路径、推进方式和创建模式都有所不同。

### （一）实践驱动的演进路径

从1968年10月起,德国用半个世纪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应用技术大学体制。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演

---

<sup>①</sup>范崇夏:《产学研合作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中国高教研究》1998年第1期。

进路径是“立法保障型”:先通过国家法律将应用型高校制度确定下来,再通过依法办学逐步发展壮大。中国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演进路径是典型的“实践驱动型”或“实践摸索型”: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是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源动力,发展主要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调整,相应的法规政策相对滞后,直到应用型本科大学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后,系统的专门政策才陆续出台,以引导和规范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办学行为。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地方大学”应运而生,而地方大学并不天生就定位于应用型,只是当时地方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各类应用型人才,才使得新兴的地方大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办学方向。90年代初期,“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学科”受到关注。当时国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教育决策层强烈意识到只有人才培养类型的多样化,才可以适应复杂的市场需求,于是1993年的《纲要》第一次把重视“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学科”纳入国家政策,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地方大学就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发展应用型学科。直到21世纪到来,地方大学与应用型人才、应用型学科的关系才通过国家政策结为一体,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概念和地位才由此被正式确定。

## （二）自下而上的推进方式

应用型本科大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高等教育系统中理念、制度及办学实践的转变。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型变迁。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具体进程为先下后上、变迁主体源于基层、先试点后推广、体现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的特点。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先立法后发展的发展模式,更接近强制性变迁,而中国走的是“从地方探索到省级试点再到中央决策”这样自下而上的推进路径,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诱致性制度变迁起源于人们期望获得制度不均衡引发的获利机会所进行的自发制度变迁。<sup>①</sup>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均衡体现在内部资源分配不均衡和外部市场关系出现供需不均衡。由于资源有限,我国长期推行建设重点大学的制度,重点大学侧重培养理论型、学术性人才。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只能通过其他院校来培养,而这些其他院校并不属于国家重点关注和支持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地方高校突破重理论、重学术的传统办学模式,自发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通过自下而上的探索路线,最终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结构的组成部分。

## （三）灵活多样的创建模式

与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具有相对统一和规范的创建模式不同,中国应用型本科大学呈现相对灵活和多样化的创建模式。

第一种是主动求变型。我国高等教育结构隐含等级化的结构特征,地方大学长期处于高等教育结构的末端。在缺乏往上层级升迁的资源时,一些地方性高校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就必须主动求变,向应用型本科靠拢,以实现与老牌本科高校错位竞争之目的。据了解,近年来不少省级应用型大学建设试点示范校,从培养应用型人才,到大力建设应用型学科和专业,再到发展成应用型本科大学,都是学校基于自身发展诉求主动求变的结果。

第二种是被动转变型。近20年新建的本科院校中,除了一部分学校主动向应用本科靠拢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定位不清、特色不明、摇摆不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从2014年开始陆续出台文件,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本科大学转型。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一部

---

<sup>①</sup>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分地方高校,按照国家政策逐步转变为应用型本科大学。

第三种是国际合作型。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也是创建应用型本科大学的重要模式。典型的是中德政府合作办学的部分高校,如合肥学院、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等,它们通过与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深度合作,探索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 三、变革方向

按照目前发展趋势,中国高等教育将在未来十年内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分类发展变得更加迫切。经过40年的艰难探索,国家教育决策部门已经清晰认识到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重要性,并有多项重大政策出台。按照哈维洛克和古德的教育变革理论,教育变革分为计划变革和自然变革。中国应用型本科大学早期建设接近实践驱动的“自然变革”,而现在已经走向由国家统筹各省级政府推进的“有计划变革”。既然是“有计划的变革”,就有必要在系统梳理40年应用型本科大学成绩与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其变革方向,以推动新时代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

#### (一) 消解敏感点:依法确立应用型本科大学的“社会威信”

伯顿·克拉克在分析比较几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后发现:“现存高等教育结构的敏感装置决定了往后的变动方式”。<sup>①</sup>“敏感装置”也可以解释为高等教育变革中的敏感点,它很可能成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阻碍因素。伯顿·克拉克还提出过一个大学“社会威信”的概念:“各大学通过把毕业生输送到什么样的地位而被给予不同的社会威信”。天野郁夫进一步把“社会威信”理解为大学的“无形资源”<sup>②</sup>。从中国的情况看,“社会威信”不高,即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应用型教育或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心理,始终是制约应用型本科大学发展的一个敏感点。

根据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确立应用型大学社会威信最关键的举措就是立法。德国于1968年讨论通过的《联邦共和国各州高等学校协定》,正式提出创建应用技术大学。8年后的1976年,德国《高等教育总纲法》正式明确了应用技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法定地位,教学与科研的自由以及管理的自主权得到了法律保障,从而确立其社会威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应用技术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已占据半壁江山,其地位稳固而重要。

我国应用型大学虽历经40年的磨砺,但其地位依然还没得到国家法律的确认,校企合作、双师型师资建设等一些应用型本科大学建设中的关键环节也没有得到相关法规的强力支持,这些都对应用型本科大学的“社会威信”产生影响。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通过立法确立高校分类发展的原则,确定应用型高校与其他类型高校属于“同等地位但不同类型”,并将应用型本科大学的相关办学行为进行固化,这样才能真正确立应用型本科大学的社会威信,规范其办学行为,推动其健康、快速发展。

#### (二) 解决关键点:探索应用型本科大学办学新模式

应用型本科大学建设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结构组成和运行机制上给予支撑,也需要应用型本科大学自身有实质性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应用型本科大学不同于其他大学的办学模式。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技术大学的Lackner教授认为“国际化视野、地方性根植、跨学

<sup>①</sup> [日]天野郁夫:《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陈武元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sup>②</sup> [日]天野郁夫:《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第247页。

科专业设置、应用性为导向的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发、紧凑学习安排、小班教学原则”等七个特征是应用技术大学办学模式的关键所在。<sup>①</sup>从这七个特征来看,我国应用型本科大学多数仍处于名不副实的局面。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复杂。除了社会威信不足外,我国应用型本科大学缺乏欧洲发达国家强大的中职教育基础支撑,在办学经费上难以应付远比培养理论型人才更为高昂的成本,国家对校企合作等关键环节的政策支持也明显不足。加上,应用型本科大学处于本科高等教育体系的底端,出于提升地位和掌握更多资源的考虑,难免面临向研究型大学“漂移”的诱惑,导致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符合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办学模式。

因此,探索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应用型本科大学办学模式是推进我国应用型本科大学发展的关键点。这需要有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路线图:首先要明确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基本规格;然后围绕人才基本规格构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包括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过程、课程设置、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一套体系;再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办学模式,包括办学目标、相关制度、师资队伍、产教融合、招生就业等更大层面的制度与机制设计。

这个路线图的逻辑起点是明确应用型本科人才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长期模糊不清的原因是人们有意识地回避应用型本科就是高职本科的事实,这导致应用型本科大学与改革开放前创办的行业类大学难以做出明确区分,也造成应用型本科大学在实践中“高不成,低不就”无所适从之窘境。本文第一作者曾撰文提出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日本科学技术大学等应用型本科大学就是高职本科,这里不再赘述。<sup>②</sup>如果把应用型本科明确纳入高职教育系列,与专科高职和研究生高职(专业硕士博士)上下衔接,应用型本科的人才规格就变得明晰起来,围绕人才规格构建起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模式就有明确的依据和坐标,办学特色不明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 (三) 突破困难点:构建“四位一体”产教融合大格局

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大学办学模式的关键环节,是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实现“自我发展”和“错位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学科本位”“知识本位”的影响,论文数量和学科排名成为评价高校办学实力和办学声誉的风向标,产教融合长期处于弱化和虚化的局面。近十年来,产教融合逐步受到关注,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但对于大多数应用型本科大学而言,产教融合仍然是改革发展中的一个难点和痛点。由于办学定位不明,自身研发及合作能力不足,学校对该瞄准哪些产业和市场需求来进行产教融合并不清晰,加上企业对融合也不积极,导致产教融合仍然处于浅层次、自发式、松散型、低水平状态。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同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首次明确了深化产教融合的政策内涵及制度框架,即“四位一体”的产教融合大格局:强调发挥政府统筹规划、企业重要主体、人才培养改革主线、社会组织等供需对接作用,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整体制度安排,推动产教融合从发展理念向制度供给落地。

若把《意见》置于改革开放40年应用型本科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会发现,这可能是对应用型本科大学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重要文件。构建“四位一体”大格局,产教融合就不只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集教育制度、经济制度、产业制度和人事制度于一体的整体制度安排,这将大大提升产教融合

<sup>①</sup>Hendrik Lackner、徐刚、陈颖:《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体制——对中国也是一种成功模式》,《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

<sup>②</sup>李均、赵鹭:《发达国家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以美、德、日三国为例》,《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7期。

的战略地位,从顶层设计上统筹了产教融合实践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缓解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制度割裂矛盾。

有学者建议: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产教融合促进法》,“理顺产教融合的法律关系”,“明确产教融合各方主体的公法义务”。<sup>①</sup>这个建议值得重视。40年来推动应用型本科大学发展的政策多为非指令性政策,灵活性强,但执行力弱,一些关键的措施难以落实。德国以促进产教融合为目标的“二元制”就是通过法律确认的,而中国的“四位一体”大格局要真正推动产教融合,也应该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以立法形式明确产教融合的强制性,就可能彻底解决产教融合这个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关键难题,进而牵一发动全局,推动新时代应用型本科大学做大做强。

(责任编辑:蒋永华)

##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form of China's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LI Jun, HE Wei-guang

**Abstract:** Over the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whose developmen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embryonic form, mode exploration, scale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ir develop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following a practice-driven path”, “adopting a bottom-up mode” and “being diversified in the form”.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social prestige” of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law, explore the new model of development for such universities and construct the “four-sphere integrated” pattern of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Key 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

<sup>①</sup>袁靖宇:《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的历史观照与战略抉择》,《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4期。